

中国的贸易发展战略及绩效

盛斌

(南开大学国际经济研究所, 天津, 300071)

摘要: 本文在理论分析的基础上, 利用“多指标法”对改革开放以来二十多年的贸易发展战略的演变进行了阶段划分, 阐述了政策变化的特点和制度背景, 并比较了不同阶段的经济实绩。

关键词: 中国; 贸易发展战略; 绩效

中图分类号: F **文献标识码:** A

1 贸易发展战略的理论测定

研究贸易发展战略的选择与演变对认识一国的工业化进程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贸易发展战略”是指通过贸易和工业政策改变可出口品和可进口品之间的相对价格来达到有偏向的刺激生产的政策。具体说, 当贸易发展战略既不歧视内销的生产或出口的生产, 也不歧视购买本国商品或外国商品时, 它就被视为促进出口的“外向型战略”或“中性贸易体制”, 而鼓励内销的政策则是“内向型战略”或者“进口替代”的¹。

贸易中性或出口导向体制的实现可以通过三种途径。首先是标准的自由贸易形式, 国内价格与国际价格接轨, 进口保护与出口补贴的刺激有限, 香港和新加坡的自由贸易体制是典型的例证。第二种方式是建立在最新发展起来的“三部门模型”基础上, 即同时实施进口替代与出口导向可导致可进口部门和可出口部门的同时扩张, 而以非贸易部门的发展为代价。如果生产可进口品的非贸易品的要素是类似的, 进口保护可以使这两种商品相对于可出口商品的价格上升, 从而具有反出口偏向, 此时就需要用出口鼓励政策来加以纠正; 如果生产可出口品和非贸易品的要素是类似的, 则进口保护仍使可出口品的价格相对于可进口品的价格下降, 但此时需要的出口刺激比前种情况小。这种用出口奖励来抵消反出口偏向的贸易战略可称为“受保护的出口导向”。进一步讲, 如果给予出口活动的刺激基本抵消了面向国内生产和销售的保护程度, 则实现了“被扭曲的中性贸易”。以它为判断标准可以衡量各种出口奖励措施抵消进口替代偏向的度。抵消不足, 仍为反出口偏向; 抵消有余, 便是鼓励出口。日本、韩国、台湾都曾采取过这种特殊的外向型政策。最后, 通过取消现有的贸易壁垒, 将汇率贬值, 逐步取消特定的出口鼓励措施, 而依靠价格机制来分配生产资料的途径称为“进口自由化的出口导向”战略, 实例比如80年代中期以后的一些拉美国家。

已有的文献中对贸易发展战略或贸易取向的测定数量共有两类方法。第一类是多指标法, 最先由 Greenaway 和 Nam 提出, 1987 年世界银行利用该方法对发展中国家进行了迄今为止规模最大的关于贸易战略的研究。他们试图结合一组数量和质量的指标, 对一个国家的贸易战略加以区分。第二类方法是多种定量性的单项指标法, 包括: “扭曲指数”(Agarwala)、“贸易自由化指数”(Michaely, Papageorgious 和 Choski); “交互出口条件”指数(Kavoussi);

¹ 按照这种广泛被接受的划分标准(世界银行, 1987), 出口导向与进口替代并不是对称的, 中性贸易(自由贸易)和偏向出口的政策都是促进出口的贸易取向。不过, 一些经济学家(如 Krueger)对出口导向的含义的理解略有不同, 他们认为只有当对出口的刺激超过了面向国内生产和销售的保护程度时, 才可称之为出口导向政策。在这种情形下, 出口导向与进口替代的定义就是对称的, 其分界点为抵消后的贸易中性。

Singer 和 Gray) ;可进口品和可出口品相对加权价格之比的偏向指数 (Krueger) ;“有效汇率” (Bhagwati、Balassa) ;出口和内销的名义保护率、实际保护率和实际补贴率 (Balassa) ;截面分析的贸易导向指数 (Chenery, Robison 和 Syrquin) 等。

2 中国贸易发展战略测定的方法

由于缺乏足够和有效的年度数据,我们无法利用单项数量指标对中国的贸易发展战略的演变进行精确的刻画,因此本文采用了质量指标描述的多指标法,该方法吸收了 Greenaway (1987) 以及 Krueger (1978)、Bhagwati (1978)、Bruno (1978) 和 Keesing (1979) 的一些研究成果。

对中国的实证考察从以下几个方面展开:(1) 关税和其他进口税保护的程 度,保护率越高,对进口替代的偏向也就越大,但关税制度要优于不透明的数量限制政策;(2) 运用诸如配额和进口许可证等数量限制,经济中对进口实行广泛的数量限制说明较高的生产和销售的内向型程度;(3) 对进口的补贴,如果对行业生产所需要的中间投入品和设备的补贴越高,对该行业所生产的最终产品的内销偏向也就越大;(4) 采取对出口贸易的奖励的办法,它们反映了对出口鼓励的刺激或抵消进口替代的程度;(5) 出口限制政策,其力度越大反出口的偏向也就越高;(6) 外汇管制和汇率定值的程度,自由的贸易体制要求经常项目下外汇的可兑换,消除多重汇率制,保持正确的汇率(避免汇率的严重高估),并使进口和出口贸易保持大体相等的实际汇率水平。图 1 (见文末) 记录了中国 1980-1998 年间上述六个方面的政策变化,通过多指标分析将近 20 年的贸易战略大致分为“进口替代与边际出口导向”(1980-1983 年)、“以出口促进抵消进口替代”(1984-1990 年)、“出口促进与边际贸易自由化”(1991-1993 年)和“贸易自由化”(1994-1998 年)四个阶段。下面依次加以分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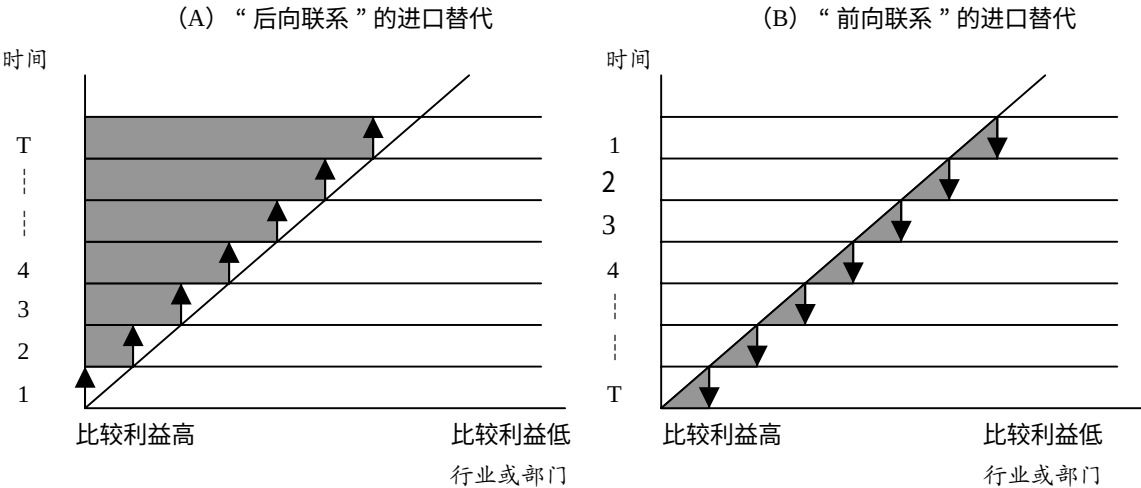
3 计划体制下的进口替代战略(1979 年前)

在分析第一阶段之前首先对中国经济改革之前传统的进口替代战略进行简要的分析,因为这种政策一直影响到 1979 年,并对中国以后的工业发展政策和模式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中国在获得民族解放和国家独立后急切地希望摆脱经济制度中的殖民主义色彩和实现经济发展的独立自主,政府认为工业化是实现这一目标的唯一途径,而替代进口战略为工业化道路提供了在理论和政策上的一整套依据和可行办法,而且在当时面对经济封锁的国际环境和外汇紧缺的情况下也是唯一的选择。这与战后 50 年代亚洲和拉美发展中国家选择进口替代战略的背景是相类似的¹。但是,中国的进口替代战略与东亚其他国家和地区不同。后者是

¹ 对于广大发展中国家在 50—60 年代盛行进口替代战略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这一点对于中国可能不是很适用)是所谓“出口悲观论”,该观点认为从事初级产品的生产和出口会面临多方面的不利前景,如:技术更新使工业对初级产品的需求数量日益减少,产品收入需求弹性低,容易受到人工合成原料的替代,等等。相比之下,制成品的销售市场和技术成果为发达国家所垄断,工业国经济周期的波动经常波及并转嫁给发展中国家。因此从长期来看,发展中国家在对外贸易中面临着极为不利的贸易条件,形成“不平等交换”和“贫困化增长”现象。同时它对工业国吸收发展中国家迅速增长的出口产品(初级产品或制成品)的能力持悲观态度,故而希望发展国内工业生产以实现“平衡增长”。“出口悲观论”的支持者在政策上鼓吹政府应通过保护和奖励措施干预国内工业部门的发展,改造单一的初级产品生产结构和贸易结构,摆脱历史上长期形成的工业国与发展中国家之间的“中心—外围”体制。80 年代中期,随着新贸易保护主义的威胁达到顶峰,“新出口悲观论”曾经再度兴起。Krueger (1984) 将这种“贸易条件论”作为发展中国

从非耐用消费品的替代进口入手，发挥其丰富而廉价的劳动力资源优势，在竞争力增强后又转向鼓励出口，出口积累的资本能够为次级进口替代打下基础，促进了产业继续向耐用消费品、中间产品和资本品的升级。这样的贸易战略是顺比较优势的，在每个阶段新的工业的发展都是基于需求方面的“后向联系”，而且进口替代的目的最终还是为了鼓励出口，形成了“狭窄的 moving 的保护带”（narrow moving band, Krugman, 1984），并不断扩大了具有比较优势的部门数量和提高了工人的工资率。图 2（A）描述了日本、韩国和台湾（省）等东亚国家或地区这种“后向联系”型的进口替代战略。相反，受苏联和东欧社会主义国家重工业化模式的影响，中国采取的进口替代战略是“前向联系”导向型的，试图从供给方面由下游的重化、机械部门向上游的中间产品直到消费品进行依次保护，因此是逆比较优势的（如图（B）所示）。由于进口替代部门都是资本密集型的，所以生产成本很高而效益很低（“X—无效性”）。这一方面造成这些部门在国际市场上不具有竞争力，在长时期内也就不能放开保护，更不能扩大出口；另一方面必须压缩对消费品的生产投入，从而引发了严重的短缺经济，同时农业和原材料等部门的价格被人为的压低以为重工业积累资金，造成了这些部门一边是发展瓶颈而另一边是生产资料浪费使用的奇特现象。最后，在这种战略下劳动工资率也被制定得很低，因此禀赋本已丰富的劳动力在就业系数低的重工业体系下就显得更加过剩。

图2 两种进口替代战略的对比



注：图中与横轴平行的直线从左向右代表比较利益由高向低排列的一组部门（行业），这类似于按照单一生产要素的李嘉图模型中的不同部门的生产率之比进行排列，或者是多要素的H—O模型中按不同部门生产要素禀赋比排列的瓦尼克链，而从原点出发的斜线与上述平行线的交点是李嘉图模型中的相对产出（或工资率）比，或者是瓦尼克链中的国家相对大小值。在交点以左为有效率生产的部门，交点以右为无效率生产的部门，阴影表示在一段时间内通过进口替代后可能获得竞争力的行业。

4 进口替代与边际出口导向（1980-1983 年）

1979 年后，随着对外开放政策的实施，中国在一定程度上放弃了传统的进口替代战略，开始注重发挥比较优势来扩大出口，从而使出口企业看到以世界价格衡量的大致正确的相对价格，国内市场与国际市场的长期隔绝被打破了，但这种鼓励措施还是“边际”意义上的，主要包括在广东和福建两省设立经济特区以吸引进行劳动密集型产品出口加工的外国资本、

家政府进行贸易保护的政治经济原因之一。

允许部分地方的外贸公司留存一定比例的出口创汇，开办外汇调剂市场与额度借贷业务，形成高于官方汇率的调剂汇率等¹。但从全国的范围来看，贸易计划和汇率高估使反出口偏向仍然非常强烈。

5 以出口促进抵消进口替代（1984-1990 年）

在第二阶段，1984 年中国对试行的外汇留成的出口鼓励措施进行了正式的推广，并于次年开始实施出口退税政策（尽管是不彻底的退税）。1988 年的一揽子外贸改革中进一步增加了对外销的鼓励，包括试行多元的按商品分类的外汇留成制度、全面的出口退税、鼓励来料加工和进料加工的出口、发展国家出口商品基地、扩大出口信贷。轻工业品、工艺品、服装和机电产品的出口受到特别的优惠照顾。从这些方面看，出口导向的外向型战略比前一段时间的“边际”鼓励有了明显的增强。但是另一方面，中国并没有采取取消进口贸易壁垒和汇率贬值的办法来实现对出口的鼓励，相反进口保护和本币定值过高的进口替代政策仍在被广泛地实施着。例如 1984—1985 年进口许可证制度得到恢复，并对进口品征收“滑动关税”性质的“进口调节税”，1985 年和 1988 年的高通货膨胀使人民币实际汇率明显升值，虽经两次较大的贬值（1986 和 1990 年），但没有从根本上消除本币定值过高的问题，1987—1990 年间官方汇率和加权汇率高估了约 32%，从而损害了出口的利益（见表 1），这一点也反映在从 1986 年后不断拉大的官定汇率和二级市场汇率（可以代表外汇黑市的汇率升水）的差距上。因此我们将 1984-1990 年这段期间特殊的贸易发展战略称为“以出口导向抵消进口替代”或“受保护的出口导向”（盛斌，1996）。

表 1 人民币汇率的变动(US\$/RMB): 1980-1994年

年份	官方汇率	调剂汇率	加权名义汇率	官方实际汇率	加权实际汇率
1980	1.5	-	1.5	1.5	1.5
1981	1.7	-	1.7	1.82	1.82
1982	1.89	-	1.89	2.02	2.02
1983	1.98	-	1.98	2.10	2.10
1984	2.32	-	2.32	2.15	2.15
1985	2.94	-	2.94	2.76	2.76
1986	3.45	-	3.45	2.93	2.93
1987	3.72	5.47	4.46	2.98	3.57
1988	3.72	6.31	4.86	2.57	3.35
1989	3.77	6.24	4.94	2.34	3.06
1990	4.78	5.81	5.23	3.01	3.29
1991	5.32	5.85	5.74	3.25	3.50
1992	5.51	6.58	6.37	3.14	3.63
1993	5.76	8.41	7.87	2.82	3.86
1994	8.62	-	8.62	4.61	4.61

注：①加权名义汇率 = $r \times \text{调剂汇率} + (1-r) \times \text{官方汇率}$ ， r 为外汇留成比例；

¹ 1981 年中国还采取了贸易收支的（官方）内部结算汇率和非贸易收支的官方汇率，前者高于后者以鼓励商品的出口和限制服务贸易进口，这种制度于 1984 年被取消，贸易和非贸易收支仍然恢复采取单一的官方汇率。

②官方实际汇率=官方名义汇率×(美国批发价格指数/中国消费价格指数)(1980=100)；

③加权实际汇率=加权名义汇率×(美国批发价格指数/中国消费价格指数)(1980=100)；

资料来源：官方汇率、调剂汇率、加权名义汇率为世界银行（1993）数据，价格指数由IMF，*Financial Statistics Yearbook*（1980-94）得到

从贸易理论可知，对进口的征税是对出口的隐含惩罚，因此需要用出口鼓励来消除它。根据前面的三部门的经济模型，如果生产可出口品和非贸易品的要素是类似的，则进口保护可使出口品的价格相对于可进口品的价格下降，从而具有反出口偏向，因此需要出口鼓励加以抵消，但其程度会相对较小。由于中国的出口产品和非贸易品基本上均属于劳动密集型的，因此用出口鼓励来消除进口保护对产品内销刺激的压力就要相对小一些。不过对于 80 年代中后期的中国经济来说，虽然存在若干鼓励出口的优惠措施以及计划贸易下残存的出口补贴，但由于对进口的保护过高以及严重的实际汇率升值，抵消进口替代的出口刺激可能是很不足的，因此“受保护的出口导向”战略的加总偏向在最初仍然是较强烈地反出口的，不过这种对生产内销的鼓励随着时间的推移而不断减少¹。

为什么会形成这种双向的刺激结构呢？这主要与该时期中国改革的政治经济学有关。一方面，从行业内角度来分析，政府没有拆除逐渐获得国际竞争力的非耐用消费品（如纺织品、服装和鞋类等）的国内市场的保护壁垒，而是继续通过国内的“溢价”保持企业的垄断利润，这种政策会提高对最终产品的实际保护水平，内销的倾向因此而增大²，故而需要一定的出口鼓励来纠正对内销生产的过度刺激以保证出口创汇。在这种情况下，替代进口和出口扩张的混合体制能够同时实现。对中国按竞争程度分类的行业的保护结构的分析表明那些主导性出口部门——食品制造业、纺织业、服装业和金属加工业的名义保护率都大大高于与进出口相竞争、与进口相竞争和与进口不相竞争的工业，而这些部门的实际保护率则更高些，反映出“中国对传统比较优势产品实行高保护以限制其同类产品进口，同时依靠补贴的方式维持在国际市场上的竞争力”（盛斌，1996，第18页）。这与东亚其他国家和地区的保护结构是非常不同的，后者对出口工业的保护程度是最低的。另一方面，从行业间角度来分析，中国似乎并不愿意彻底地纠正“后向联系”的进口替代战略，追求重工业发展的目标仍使政府继续维持对资本品的高保护³。但这样就会削弱对那些有比较优势的劳动密集型产品的实际保护，因此只能通过出口补贴来加以抵消。这样既保持了对比较优势产品的出口刺激，又避免了拆除贸易壁垒后对低效率的资本品生产的冲击。最后还要指出的是，对于那些尚不具备比较优势的产品，国家往往也规定了出口目标，但由于出口的产品是按照国际价格水平来确定的，通常要低于国内生产的边际成本或者平均成本，

¹ 需要特别说明的是，世界银行的报告（世界银行，1993）曾指出如果将中国 80 年代中期实施的价格双轨制考虑进去的话，那么中国在这一时期的贸易战略具有浓厚的“实质上的进口导向”（*de facto import promotion*）色彩。因为在双轨制下国家对出口采取严格的管制以保证国内供给，而计划价格滞后于市场价格又抑制了进口替代的发展，从而产生更大的进口饥荒。1990 年后绝大多数商品价格被放开后，这种情况才有所改变。这种特殊的发展战略对进口替代和出口导向都有强烈的反偏向政策，它使进口最大化而出口最小化，以保证紧缩条件下国内投资和消费需求，这在一定程度上能够解释中国 80 年代中期出现的严重的贸易逆差现象。在历史上，60 年代的哥伦比亚和 80 年代的匈牙利由于当时国内特殊的原因曾实施过这种政策。

² 同时政府对生产有比较优势的产品的中间产品和资本品的进口实行特别规定的免税或减税政策（如对加工贸易的优惠），这种政策会进一步提高对最终产品的实际保护水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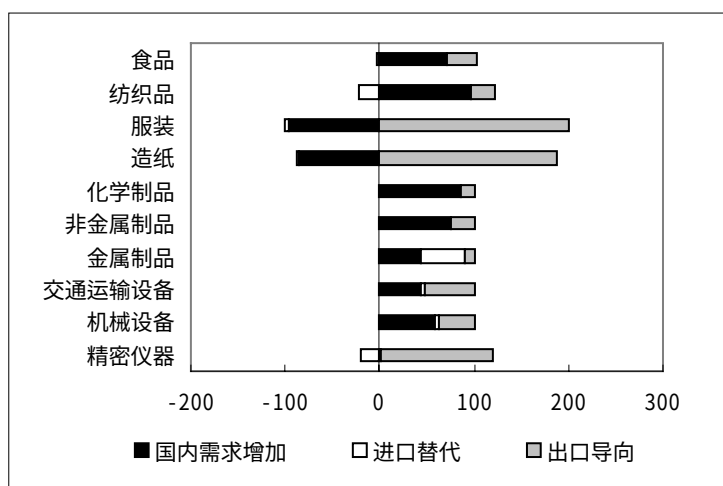
³ 盛斌（1996）对按照用途划分的产品的保护结构的分析表明中国对资本品的名义保护率仅次于消费品，而实际保护率则是最高的。

因此企业需要得到出口补贴才能实现目标，这样在受保护的国内市场上获得的利润就能够部分地抵消出口的亏损。

综上所述，“受保护的出口导向”战略是试图以出口刺激来抵消进口替代的偏向来实现贸易“中性”，该战略政治上的好处是在确保已有既得利益的集团（长期受保护的行业）不受损失的情况下，发展那些具有比较优势的新兴的出口利益集团，而且通过分割市场维持后者在国内市场上原有的垄断利润。它不会很快破坏低效率的旧的国有企业的商业存在，避免了进口竞争对它们“一夜间”的致命冲击，而是以出口的扩张来实现“帕累托改进”，并通过出口制造业的技术溢出、示范效应和产业联动逐步提高进口替代部门的竞争力。这种战略与中国整个经济渐进式的“增量增长”的改革路径是一脉相承的¹，也是后期贸易自由化能够取得成功的重要的政治基础。图3显示了对1985-1990年间中国12个制造业部门经济增长因素来源的分解，所有部门在这期间的出口扩张的贡献率都是正的，表明了顺比较利益战略下的出口偏向，特别是服装、造纸等行业获得了迅速的出口增长，它们不但发挥了资源禀赋的优势，还严重依赖于进口投入（如加工贸易）和国际市场需求，因此成为支持政府贸易改革的主要利益集团。而化工、金属制品、交通运输设备和机械等行业的进口替代和出口扩张得到同时增长，这些部门大都是与进口相竞争的工业，政府通过双向鼓励措施不但使它们继续保持在国内的市场占有率，而且也在出口鼓励的政策下分享创汇的红利。

图3 1985-1990年中国主要制造业部门经济增长的因素来源（%）

¹ 对中国经济改革相对于俄罗斯和东欧国家更成功的原因的分析很多，许多人认为“渐进式”而不是“激进式”的改革方式是其中的重要原因，例如中国的价格改革从双轨制到完全放开，外汇制度从外汇留成到经常项目下的自由兑换，汇率从复汇率制到单一管理浮动制，企业改革从承包制到自负盈亏再到现代企业制度等都是具有“过渡成本”的改革措施，但由于对社会的震荡和冲击效应相对较小，不会引发人民对改革在短期内的强烈反对而使改革出现急剧逆转的情况。而俄罗斯和部分东欧国家在恶化了的政治环境下被迫走上“休克疗法”式的经济改革道路，在产出、就业和生活水平绝对下降的情况下人民失去了对改革的信心和支持。这种解释有一定的说服力，但作者更同意用“增量改革”与“存量改革”的概念来比较和解释两种改革道路。具体讲就是，“增量改革”指在改革中总的说来只有相对受损者（收入分配变化），而无绝对受损者（收入或利润的下降），几乎每个人在改革中都能够从经济增长获得好处或得到补偿，例如中国的农村改革、非国有企业的壮大等，而“存量改革”则是指在无增长或负增长的改革过程中直接进行国民收入的再分配，而使相当一部分人的利益绝对受损，他们因而成为改革的主要阻力。在本文的贸易战略分析中，进口替代部门能够在出口导向部门增长的同时受到政府的继续保护和补贴而获得发展，并不像激进的贸易自由化那样迅速地改变可出口品和可进口品的相对价格，进而大幅度地减少进口替代部门的利润和就业水平，因此可以说是“增量改革”的一个例证。关于对中国改革的方式和路径的分析可以参见张维迎和易刚（1995），裴民新（音译，1996），樊刚（1996）。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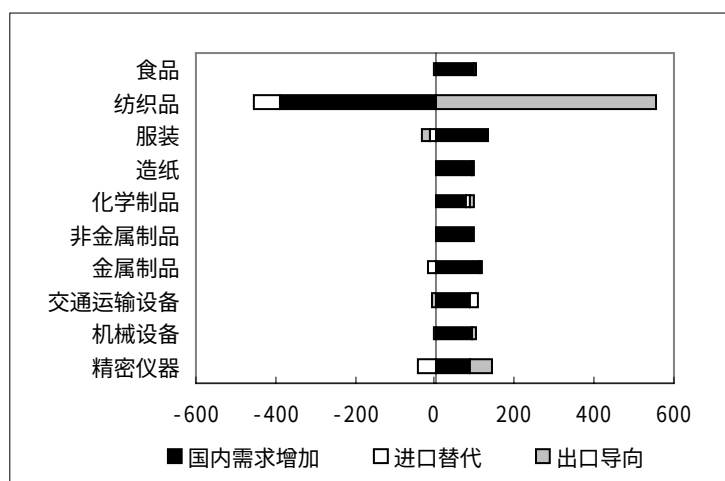
注：①对经济增长的因素分析是根据 Chenery 等（1986）的方法进行计算的。工业增长分解为进口替代、国内需求（包括中间需求和最终需求）和出口扩张三种效果。由于缺乏两期可比的投入产出表，我们忽略了投入—产出系数变化对经济增长的影响。设 Y 为国内产量， D 为国内总需求， M 、 X 为进口和出口， S 为国内总供给（ $S=Y+M$ ）， m 为进口占总供给的比率，以 0、1 分别表示基期和计算期，国内产量的增长分解为： $\Delta Y=(m_0-m_1)S_1+(1-m_0)\Delta D+(1-m_0)\Delta X$ ，右项三部分依次为进口替代、国内需求和出口扩张效果。②“服装”部门包括服装、鞋帽与皮革的生产；“造纸”部门包括造纸和文教用品生产；“机械”部门包括机械、电子及通讯设备、电气器材的生产。

资料来源：世界银行（1993，附表数据）和国家统计局，《中国统计年鉴》（1985-1991）

6 出口促进与边际贸易自由化（1991—1993 年）

1991-1993 年是改革开放后中国贸易发展战略的第三个阶段。这个时期最突出的特点就是中国开始了对进口贸易体制的重要改革，包括：连续降低关税的平均水平和取消进口调节税，削减进口计划、配额和许可证，宣布取消进口替代清单并承诺不再制定这样的措施等。这是中国的贸易发展战略从“受保护的出口导向”向进口自由化与出口导向相结合体制演变的转折点。但是贸易自由化还是“边际”意义上的，由于关税率在 1986-1991 年间有上升的趋势，1992 年降低关税率后加权平均关税率才恢复到 1987 年的水平，而同年进口总额中受计划进口、进口许可证和配额以及第一、二进口管制等五种非关税壁垒共同限制的比例仍为 51.4%（世界银行，1993）。更重要的是外汇和汇率体制没有根本的变化，1991 年开始的新一轮贸易改革保留了外汇留成制，加上原有的双重汇率体制继续加剧了对市场价格和资源分配的扭曲——有利于计划内进口而歧视计划外进口。按照官定汇率上缴出口创汇和不断升值的实际汇率（1991-1993 年间平均高估约 44%）又损害了出口者的利益（见表 1）。另一方面，出口补贴从 1991 年起被完全废止，同时为了避免 80 年代末期出口经营秩序的混乱，政府还加强了对出口资源品的数量限制，相当于对其课收出口税。

图 4 1990-1994 年中国主要制造业部门经济增长的因素来源（%）



注：同图 3

资料来源：世界银行（1993，附表数据）和国家统计局，《中国统计年鉴》（1991-1995）

边际进口贸易自由化不但降低了对最终产品的名义保护率，而且还减少了对中间投入品和资本品的进口价格，并且更有效和直接地获得外国的进口设备，从而使中国劳动密集型产品的生产能够更加有竞争力地面对世界市场，也减轻了利用出口补贴和汇率贬值来促进出口的财政上和货币上的压力¹，这种“自然”的出口导向的增长区别于那种“扭曲”状态下的“受保护的出口导向”，使得国内外的价格比体系更趋合理。在这种情况下，中国最具比较优势的纺织品行业脱颖而出，其出口导向因此并获得了惊人的增长（如图 4 所示）成为带动该部门增长的源泉。对于其他行业来说，由于比较优势相对较弱，而且随着出口补贴的废除和本币高估，对出口的“刺激”比以前大为减少，因而出口扩张对部门增长的贡献率比前一时期下降了，而国内需求（内销）则成为主要的动力。

此外，由于关税和非关税壁垒的削减，金属制品、机械设备和仪器仪表等部门的进口有所增加（图 4 中负的进口替代贡献率），表明这些部门前一阶段在高保护体制下的进口替代程度降低了，而化工、非金属制品和交通运输设备等行业仍然保持了生产的进口替代。因此总的说来，中国对中间品和资本品的实际保护率依然相当高而且多变，这主要是由于中国离散程度很高的关税结构造成的，它歧视上游部门的生产而偏向下游部门的生产。对制成品征收进口税和向资源品征收出口税使这些行业按照国际价格计算的增加值多呈现出负数²（世界银行，1993），体现出不合理的国内价格体系、较低的生产效率和不当的资源配置。这也是社会主义国家所常见的鼓励“浪费使用物质投入”和“质次产品综合症”在中国的体现（麦金农，1997）。尽管如此，边际贸易自由化仍然体现了政府决心进行更激进的市场经济改革

¹ 以 1989 年为例，政府对所有国有外贸企业和公司的补贴额高达 931 亿元，每 1 美元外贸的平均补贴为 0.30 元，每 1 美元外贸补贴对汇率的比率为 8%，参见世界银行（1993）。

² 这些产品按照国内价格计算都是正增加值，但如果按世界价格折算则为负增加值，反映了对最终产品的高保护和投入品的补贴。其证明如下：令 $P=(1+T)P^*$ ， P 和 P^* 为最终制成品的国内和国际价格， T 为进口关税； $p(1+t)=p^*$ ， p 和 p^* 为中间投入品的国内和国际价格， t 是出口税，以世界价格衡量的国内增加值 $V^*=P^*Z-p^*M=[PZ-(1+T)(1+t)pM]/(1+T)$ ， Z 和 M 分别为最终产品和投入品的数量。假定以国内价格计算的增加值为正（即 $V=PZ-pM>0$ ），但这不能保证 $PZ>(1+T)(1+t)pM$ 。如果 T 和 t 足够高， V^* 就可能是负值。Balassa（1971）指出如果国际增加值为负，就会影响对实际保护率的解释，因为这样计算出的保护系数是负的（看上去似乎是这些行业根本没有受到内销的鼓励，反而是出口更有利些）。所以应该以相对于国内增加值（而不是国际增加值）的变化来计算实际保护水平，在这种情况下，对最终产品的保护系数其实是很高的正数，它表明对内销生产的刺激信号是强烈的。

的信念和在贸易发展战略上重要的观念性的转变。

7 贸易自由化（1994 年后）

1994 年后中国的贸易发展战略进入了新的阶段——贸易自由化时期。这既是出于加快市场经济体制建立的考虑,也是为融入一体化的世界市场和与国际贸易规则相适应而采取的措施。除了连续对关税和非关税壁垒进行较大幅度的削减外,关税结构中的梯度差距也被大大缩小,使根据实际保护率促进或扼制各种制造业活动的偏向更趋向于“中性”(李善同,翟凡,1996;世界银行,1997)。进口税和出口税的削减还有利于理顺国内的价格体系,使得国内企业在生产中更好地面对世界价格进行核算,廉价的劳动力替代了更昂贵的物质投入品,从而在一定程度上纠正了按国际价格折算的负增加值的情况。多年来的外汇管制被经常项目下的自由兑换所取代,双重汇率的并轨实质上使名义汇率贬值了近 50%(表 1),而且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增加了利用汇率杠杆促进出口的能力。尽管中国在贸易自由化方面依然落后于其他发展中国家,距离开放的贸易体制的终极目标还有一定的差距,但可以肯定地说目前贸易战略改革的方向是正确的。中国对实施贸易自由化战略的态度转变是来之不易的:多年的经验和教训使政府树立了对市场的正确认识,认识到放松进口管制对扩大出口、优化资源配置、提高生产率、促进投资和积累以及改善收入分配的良性作用;在保护“幼稚工业”或“民族工业”目标下的进口替代战略非但没有取得预期的效果,反而造成体制僵化、技术落后和大量的“寻租”活动;中国参与“乌拉圭回合”多边贸易谈判加速了其贸易和投资自由化的进程,世界贸易组织规则中对新兴发展中国家给予优惠和特殊待遇的条件越来越严格,这也使中国失去了以往通过保护发展国内工业的“合法”保障。可以说实现无奖励偏向的“中性贸易”应是中国对外贸易发展战略的总目标。

8 贸易战略的绩效

贸易战略的变化对中国经济产生了怎样的影响和效果呢?我们选取了 11 个经济指标分成 4 类来考察上文划分的四个阶段的贸易战略的经济实绩,结果列于表 2 中。首先,从经济增长情况看,无论是实际 GDP 还是人均实际 GDP 都是不断加速增长的,而且与第 I 阶段的“边际”鼓励出口相比,第 II 阶段的增长率有很大的提高,类似的,与仍对国内市场实行高保护的第 II 阶段相比,后两个贸易自由化阶段的增长率也明显提高,它们反映出出口导向和贸易自由化对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

表 2 中国贸易发展战略的经济实绩比较

指标	第I阶段 1980-1983年	第II阶段 1984-1990年	第III阶段 1991-1993年	第IV阶段 1994-1997年
实际GDP增长率(%)	1.75	7.34	9.72	10.05
实际人均GDP增长率(%)	0.36	5.76	8.36	8.87
国内储蓄率(%)	32.4	36.7	40.3	40.6
国内投资率(%)	33.7	36.2	38.1	40.0
资本-产出比	0.28	0.29	0.32	0.35
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率(%)	2.28	1.40 ^①	2.90 ^②	n. a.

全要素生产率的贡献率(%)	30.2	14.9 ^①	27.6 ^②	n. a.
出口增长率(%)	7.49 ^③	16.0	14.0	19.3
制成品出口增长率(%)	12.6 ^③	21.3	17.7	21.2
制成品出口的比重(%)	53.7	64.2	79.9	85.4
外汇储备增长率(%)	-	17.7	31.4	65.5

注：实际GDP和实际人均GDP以GDP的缩减指数（1978=100）计算；国内储蓄率=（GDP—政府消费—居民消费）/GDP，GDP以支出法计算；国内投资率=（固定资产投资+存货）/GDP，GDP以支出法计算；资本—产出比为固定资产投资总量与GDP的比率；外汇储备不包括黄金；n. a.为资料空缺；—为数据计算结果不适用；①为1985-1989年数据，②为1990-1994年数据，③为1981-1983年数据

资料来源：1980—1983年的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率及贡献率根据李京文等（1993）的测算结果计算；1984—1994年的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率及贡献率引自世界银行（1996，表A和附录四）；其他数据均根据国家统计局，《中国统计年鉴》（1998）计算

其次，从积累和投资情况看，国内积累率和投资率的变化趋势与对经济增长率的分析是相仿的，从第II阶段开始的出口扩张大幅度提高了积累和投资的水平，这是因为出口的边际积累率要高于国内的平均水平，而活跃的出口制造业也往往是进行投资的主要部门。

再次，经济效率与贸易战略的关系是模糊的，资本—产出比呈上升趋势，反映了生产性投资水平的相对降低或者资金使用效率的下降（这可能是由非贸易部门造成的）。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率和贡献率为先降后升，这可能与第I阶段和第II、III阶段的估算方法和数据口径不完全一致有关（见表2中的注释），另一种解释是在出口导向战略的初期，边际出口扩张能够迅速地提高生产效率，而扭曲体制下的“受保护的出口导向”则造成了资源配置的低效。同时注意到第III阶段的全要素生产率比第II阶段有了明显的提高，反映出放开市场保护后企业能够从国外获得先进的技术和设备，并在外部竞争压力下加快技术革新和提高管理水平，这是贸易自由化带来的巨大的潜在收益。

最后，四个出口实绩指标表明趋向中性贸易体制的贸易战略有利于出口的增长，特别是制成品的出口增长，从而在较短的时期内将制成品出口的比例由54%大幅度提高到85%，长期困扰中国的外汇瓶颈问题也因此得到了明显的改善。这说明了早期的出口鼓励和后期的进口自由化措施对出口的有力刺激。第III阶段的出口平均增长率曾出现过回落，这主要是计划性的出口补贴和短期加强资源品出口控制的结果。我们对贸易发展战略不同阶段的经济实绩的比较分析引证了中国贸易体制向外向型经济和中性贸易体制转轨的正确性。

9 结论和前景

通过上述对中国贸易发展战略的阶段划分和考察，我们可以比较清晰地发现其演变的轨迹：从阻碍贸易到促进贸易；从内向型到外向型；从逆比较优势到顺比较优势；从发挥供给方面的前向关联到发挥需求方面的后向关联；从价格信号扭曲激励到坚持“将价格搞对了”的原则；从注重直接数量管制到注重通过关税、汇率和补贴等价格机制起主导作用。尽管在放弃传统的进口替代战略后没有直接走上贸易自由化的道路，而是采取了“迂回”的双向刺激结构，并为此付出了一定的过渡成本，但是它能够通过暂时的保护为缺乏竞争力的企业提供内部货币积余，并维持它们既得的利润。在企业有时间调整它们对资本存量和劳动力以及对进口品和国内产品投入的组合后，政府将原先许多隐性的保护显化为可以预见的价格等量措施（如关税税率）并承诺逐步削减它们，贸易自由化的实质进程才开始了。在这种情况下，出口行业（如低技术劳动密集型部门）得到不断壮大，并提高了人均工资率，成为支持贸易

自由化的主要力量，而进口替代部门（如资本品生产部门）获得了政府的保障、补偿和结构调整，削弱了它们对贸易自由化改革的阻挠。中国贸易战略转变的总体规律与其他发展中国家的经验是基本相仿的，特别是在经历“受保护的出口导向”后再向转贸易自由化方面与韩国、巴西和墨西哥等国的实践是相似的¹。

中国未来的贸易发展战略是什么？官方没有明确地公开说明，至多是零散地反映在某些行业或部门性的战略及前景规划中。不过可以预见在近期内贸易自由化是大趋势，但从政策动态来看政府至少在两个方面对这种进程另有考虑：一是对过快的放开进口限制给国内支柱性制造业造成的冲击有所顾忌，进口品的增加与近年来外国投资企业产品在中国市场上占有率的显著提高交织在一起，使政府注意到必须在贸易自由化的过程中节制外国企业对华攫取垄断利润，以避免利润和财富向国外不当的流失，在这方面中国具有“国内市场效应”的优势；二是优先发展高科技产品的生产和出口，中国认识到在经济一体化的世界中必须提高产品的技术含量才能够保持强有力的国际竞争力，因此需要国家利用贸易政策进行有选择性的干预和支持。这也是80年代以来兴起的“战略贸易政策”在当代中国的体现，反映了中国作为发展中大国区别于完全信奉自由贸易的新兴工业化小国的特点。但对于如何实施战略贸易政策以促进支柱行业或者高科技行业的发展尚没有系统的官方政策论述，它只是作为一种政策建议或者政策方案对中央政府的政策决策起到启发性的影响，不过政府及早作出系统性的工业及贸易政策体系的规划无疑是意义重大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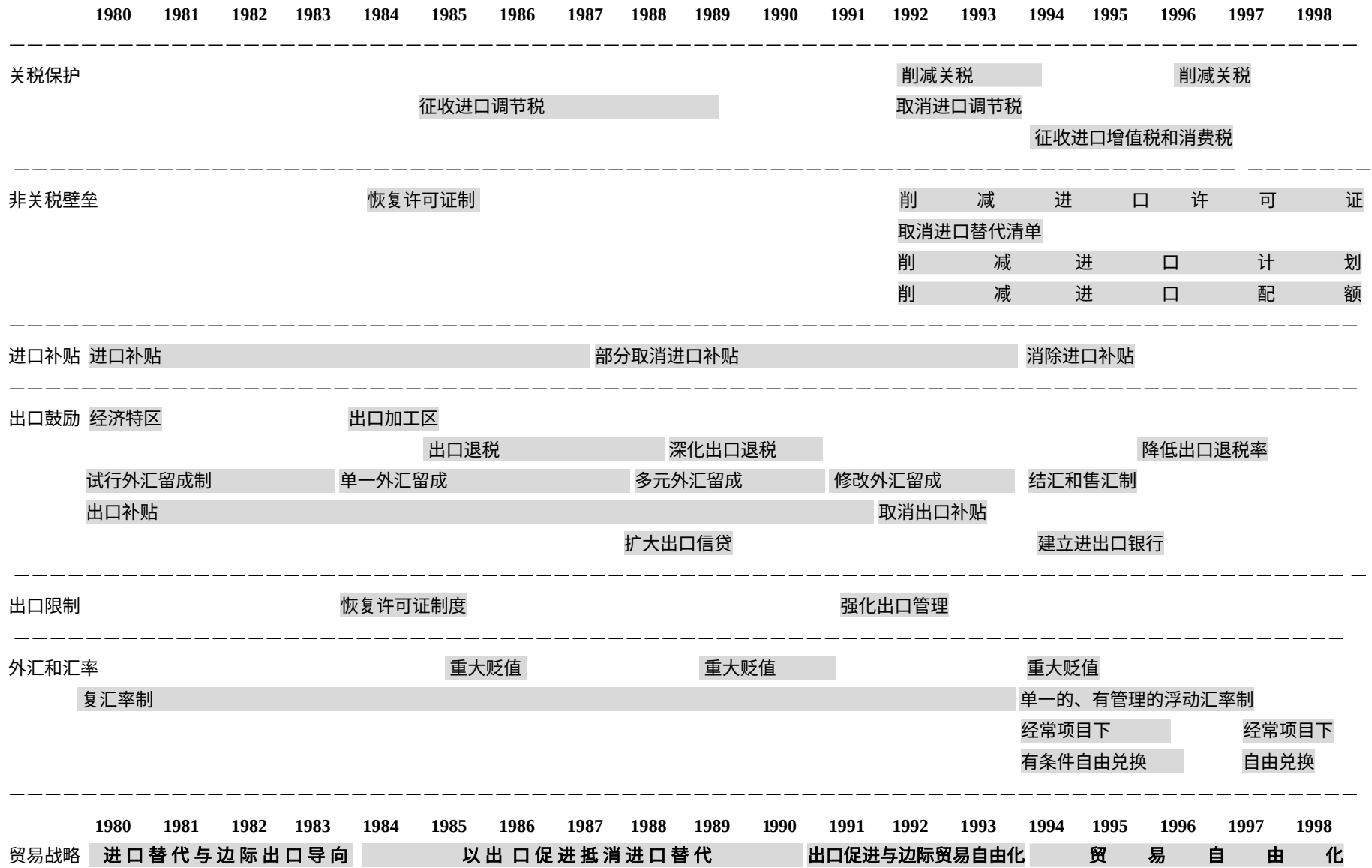
参考文献

- 【1】樊纲（1996），《渐进改革的政治经济学分析》，上海：上海远东出版社
- 【2】李京文，D·乔根森[美]，郑友敬，黑田昌裕[日]，《生产率与中美日经济增长研究》，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3年
- 【3】李善同，翟凡（1996），《中国关税现状的实证分析：水平、结构与关税减免》，《经济工作者学习资料》，1996年第74期，第7-20页
- 【4】罗纳德·I·麦金农[美]（1993），《经济市场化的次序——向市场经济过渡时期的金融控制》，周庭煜、尹翔硕、陈中亚译，上海：上海三联书店，上海人民出版社，1997年
- 【5】盛斌（1996），《中国工业的贸易取向、保护结构和经济增长》，《国际经贸研究》，1996年第1期，第13-21页
- 【6】世界银行（1987），《世界发展报告》，中译本，北京：中国财政金融出版社
- 【7】世界银行（1996），《中国经济——治理通胀、深化改革》，中译本，北京：中国财政金融出版社
- 【8】世界银行（1997），《中国的参与：与全球经济的一体化》，中译本，北京：中国财政金融出版社，1998年

¹ Krueger和Bhagwati在1978年主持的美国国家经济研究局的项目中根据一国对采取数量手段作为控制其贸易和支付工具的依赖程度，将贸易体制演变经验归结为五个阶段：“第一阶段的特点是实施或强化相对无差别的或者全面的进口管制，其目的通常是影响国际收支平衡……；第二阶段的特点是继续依靠数量限制，实际上是增强了对整个控制系统的普遍约束……；第三个阶段通常从汇率平价正式变动开始，以断断续续的贬值来反映外汇的实际价格，还伴有取消某些实施细则的行动以减少在第二阶段出现的多重汇率制度……；第四阶段的特点是大幅度削减在国际收支方面的数量限制，而更加强调（关税等）价格机制……；第五阶段是外汇制度充分自由化的时期，在这个意义上说，对经常帐户所得的外汇实际上可以完全自由兑换，而且不再采取数量限制作为调节国际收支的一种手段。”巴格瓦蒂将第四阶段和第五阶段视为鼓励出口的战略，因为它们对可出口商品和可进口商品基本上提供了等等的奖励，而前三个阶段是有明显的进口替代倾向。显然按照这个标准，中国目前基本上处于第四阶段到第五阶段之间。

- [9] Balassa, B., ed. (1971), *The Structure of Protection in Developing Countries*. London: The Johns Hopkins Press Ltd.
- [10] Bhagwati, J. N. (1978), *Anatomy and Consequences of Exchange Control Regimes*. Foreign Trade and Economic Development, Vol. 11. Cambridge: NBER.
- [11] Chenery, H., S. Robinson, and M. Syrquin (1986), *Industrialization and Growth: A Comparative Study*.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12] Greenaway, D. (1987), "Characteristics of Industrialization and Economic Performance under Alternative Strategies." Background Paper for World Development Report. Washington, D.C. : World Bank.
- [13] Keesing, D. (1979), *Trade Policy for Developing Countries*. Washington, D. C.: World Bank.
- [14] Krueger, A. O. (1978), *Liberalization Attempts and Consequences*. Foreign Trade and Economic Development, Vol. 11. Cambridge: NBER.
- [15] Krueger, A. O. (1984), "Trade Policy in Developing Countries." In R. W. Jones and P. B. Kenen, eds., *Handbook of International Economics*, Vol. 1. Amsterdam: North-Holland.
- [16] Krugman, P. R. (1984), "Import Protection as Export Promotion: International Competition in the Presence of Oligopoly and Economics of Scale." In H. Kierzkowski ed., *Monopolistic Competition and International Trade*.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 [17] Pei Minxin (1996), "Microfoundations of State-Socialism and Patterns of Economic Transformation." *Communist and Post-Communist Studies* 29, No. 2: pp. 131-145.
- [18] World Bank, (1993), *China Foreign Trade Reform: Meeting the Challenge of the 1990s*. Washington D. C..
- [19] World Bank, (1997), *China 2000: Development Challenges in the New Century*. Report No. 17027-CHA.
- [20] Zhang Weiying and Yi Gang (1995), "China's Gradual Reform: A Historical Perspective. " *Working Paper Series*, No. E1995001. China Center for Economic Research, Beijing University.

图 1 中国贸易发展战略的演变 (1980-1998 年)



China's Trade Development Strategy and Performance

Sheng Bin

(The Institute of International Economics, Nankai University, 300071)

Abstract The paper aims to describe and analyze different phases of evolution of China's trade development during two decades based upon the method of “multiple indexes”. It also studies the features of policy variations and related institutional background, and makes comparisons on economic performance among different phases.

Key Words China; Trade Development Strategy; Performance

